

苏联创造性的达尔文主义

普列森特著

科学出版社

Q-02

4

苏联创造性的达尔文主义

И. И. 普列森特 著

米景九 李燕笋 译

科 学 出 版 社

1956年9月

內容提要

本文是苏联达尔文主义的权威普列森特院士寫作的。原文刊载于“農業生物学雜誌”1947年第6期中，其后又被选入“米丘林生物学諸問題”第一集中。

本文不僅精辟地闡述了苏联創造性达尔文主义的实質，而且也依据了大量的國內外文献揭發了魏斯曼、孟德尔、摩尔根主义的唯心本質。本文被推荐为学习达尔文主义的經典文献之一。

本文可以作为大学师生、中学教师学习达尔文主义的参考。

苏联創造性的达尔文主义

СОВЕТСКИЙ ТВОРЧЕСКИЙ ДАРВИНИЗМ

原著者 [苏] И. И. 普列森特

翻譯者 米景九 李蕪箏

出版者 科学出版社

北京朝陽門大街117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61号

印刷者 北京新華印刷厂

总經售 新華書店

1956年9月第一版

1956年9月第一次印刷

(京)0001—12,440

書号：0529 印張：1 7/16

开本：787×1092 1/32

字数：29,000

定价：(9) 0.19 元

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三十周年标志着苏联人民在經濟和文化所有的領域中偉大勝利的三十年。

苏联的科学也取得了重大的勝利。只有在我國由于十月革命的成功，科学才真正成为大众的、人民的科学。世界上最先進的学者所幻想的事情——使人民参預文化和科学——在我們苏联的國土上实现了。苏联人民的廣大群众不僅是在實踐上利用科学成果的單純消費者，而且也是科学的建造者，他們創造性地参加到科学的勝利行列里。工業各部門中的斯达哈諾夫运动者，農業各部門中集体農庄的試驗者，过去和現在都对科学做出重大的貢獻。响应任何一个真正的科学成就并把它發揚和具体化的就是斯达哈諾夫运动者和試驗者；激發和推动先進科学的神經就是工業和農業的革新者。資產階級的國家中，在創造先進科学的事業上，沒有也不可能有專家学者和人民大众像这样的友爱合作。在那里科学起着可耻的作用：为一小撮資本巨头而服务，增加他們的利潤，并且在理論上和思想上武裝國際帝國主义掠奪者的陰謀和詭計。

只有在偉大十月革命所解放的蘇維埃國家里，科学才獲得了为全体劳动人民服务的真正自由、足以自豪的权利和高貴的義務。在这新的道路上，科学就兴盛繁荣起來了。

在苏联生物科学里，也發生了一个很大的質上的变动。与西欧和美國生物科学相較，它的基本优点在于高度的思想理論水平以及可意識到的實踐上的目的性。

我國生物科学的理論基礎是創造性的达尔文主义。

苏联生物科学掌握了先进生物学思想的最高的理论成就——达尔文主义。从前达尔文主义原是资产阶级文明的繁荣所产生的。但是达尔文主义那些主张自然界历史观的进步思想对于退化的辩护者们是危险的。因为这种人想把不变法则的伪观念灌输到劳动者的头脑里，以使用这些法则为借口把剥削制度永远法定为自然的、永恒不变的制度。于是不久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制度的没落，随着它的走向它最后的阶段——帝国主义阶段，“学者们”——剥削制度的辩护人和纯粹守旧派——也就宣布了讨伐达尔文主义和达尔文主义者。在推翻达尔文主义的这些企图上，资产阶级科学的思想家以往和现在都是不择手段的：在这里以往和现在支配一切的都是伪善的条例。在美国，三K党走狗被纵放出来反对达尔文主义，他们结成基本主义者联盟，以统治精神文化和排斥进化学说为目的。基本主义者的首领布来因宣称：“进化论是文明的威胁”，他们的“防卫”杂志的某一期中，基本主义者用某一幅“美术作品”来恐吓美国的普通居民，在那里画着一个凶恶面孔的人，手持持有巨大的炸弹，在炸弹上写着“进化”，在人像下面写着：“俄国赤匪”。

但是这种黑暗势力的装腔作势，不能拯救华尔街和伦敦城区（伦敦的工商业、银行区——译者注）的巨头、法国的二百家族和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其他的大王所想像的那种“文明”。为了毒化群众的意识，就需要更确切有效的方法，于是“最新的科学成就”就被提出来说当作这种方法，这些“成就”想要推翻达尔文主义，要求回到形而上学的范畴中。譬如说，用“生物界一次便创造出它现有的样子”这类断言来引诱现代读者是很困难的。但是如果向现代读者提出一系列如下的推论：新类型的形成只有由于染色体中“基因”的

某种改变或者移动，才能發生；这类的改变不能形成动物和植物的新的科，或者其他更廣大的类群，于是讀者“根据最近的科学材料”——可以說“为事实所迫”便可能順从地听信达克和許多其他西欧以及美國古生物学家的主張，便可能相信动物和植物的各种类型(类族)並沒有共同的進化根源，它們是被独立創造的，并且在生物界整个的歷史过程中，类型的界限未曾遭受过破坏。資產階級的分类学者也不落在資產階級的古生物学家后面。鳥类学者杜格拉斯·焦阿尔一方面承認种和屬的進化，但同时却認為科和其他更高的类群並沒有進化，在一次被創造出來以后，它們只是繁衍到新的地方去，同时不变地保持自己的科、綱等性狀。另一位分类学家，蒙丕烈的教授威尔敦，主張組織的类型是独立地創造的，而以后所發生的僅僅是它們的“分化”，就是說分离成从屬的类群。英國的生物学家戴維斯以“現代批評”的观点对進化加以評論，他詳細地叙述并寫出关于这些見解：“当新科的新被創造的祖先和現有的科属于同一个总科 (Superfamily)，亞目或者目的时候，就像現有的科一样，創造也許不外乎是一种“跳躍”，这种“跳躍”是过于重大，以致于不能够用染色体的改变來解釋它，比方我們可以假定，鳥类任何一个新科的最初成員是來自某一个現有种的鳥所產的卵，但是这些卵被創造的力量变了形，以致于从卵中孵化出类似杜鵑所孵化出來的、新类型的鳥。”¹⁾

焦阿尔談到“創造的力量”，全体主义者楊格·斯馬次和他的信徒們談到“整体性”；微生物学家沃里特列克主張“空間以外的、非物質的活動力”；貝爾塔蘭非、里利亞諾、布里埃、迈耶尔和其他的所謂“有机体派”宣傳一种“有机体的

1) A. M. Davies, *Evolution and its modern critics*. London, Thomas Murby, 1937.

能力”，这个能力給予有机体以一种和歷史与生存条件不相关的天赋的合理性；馮·休涅爵士宣布某种“組織的原理”为生物学上最新的成就。在資產階級國家里，現代生物学思潮上所有的这些与其說是流派，不如說是方向——正如苏联的一位达尔文主义的古生物学家达維塔什維利談及馮·休涅爵士时所恰当地指出的¹⁾——都實質上是替上帝取了一些科学式的別号。

1929年，各資產階級國家的古生物学家和遺傳学家在德國召集了會議，以求建立生物学一般問題上的統一立場。在这一点上，他們並沒有作到。但是有一点是完全一致的，拿自己的各种“主义”來对抗在生物界歷史上創造合理性的、达尔文的选择定律。凱斯勒引証森德窩尔夫关于这會議所著的書²⁾，曾經很委婉地、但是十分肯定地說過：“無論在遺傳学家之間或在古生物学家之間，关于進化的真实性都存在着怀疑。”³⁾

一年以前，瑞典植物育种学会慶祝它成立的六十周年紀念。1946年7月12日，在紀念大会上隆德大学（Лунд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遺傳學研究所所長A.孟青出席講演⁴⁾。在他的講演詞里面，很顯著地表現了对于达尔文主义中唯物核心的态度上的反动轉变，这轉变从本世紀初便發生在資產階級的科學中。孟青說：“六十年以前，当选种工作在斯法列夫开始了的时候，达尔文的學說正占有統治的地位。

1) 达維塔什維利：“德國學者在苏联文集上的一篇反动文章”。

2) O. H. Schindewolf, Paläontologie, Entwicklungslehre und Genetik, Berlin, 1936.

3) W. E. Castle, Evolution and Genetics. Journ. of Heredity, No. 4, April, 1938.

4) A. Muntzing, Den Teoretiska Genetiken och växtförädlingen Sveriges Utsädesförenings, Tidskrift. 1946, 56.

达尔文的主旨是如下的观点：……認為自然選擇具有向一定方向改变类型的無限可能性。”新世紀——資本主義及其思想腐朽的世紀——來到了。达尔文主义的唯物基礎被宣告为过了时；并且被伪称为拉馬克主义。孟青繼續他的演講說：“利用有机体的外在影响以引起遺傳傾向改变的企圖，早在十九世紀的下半叶就已經成为迫切的問題了。那时大多数研究這個問題的人是拉馬克主义者，他們認為个体軀体上的变异能影响个体的性細胞，因而就能遺傳給后代。”为了“証明”遺傳是和有机体的生活条件及其軀体上的变异不相干，他就把魏斯曼的荒謬試驗——老鼠割了尾巴以后，后代仍然有尾巴——也搬上講台來了。虽然——正如季米里亞捷夫恰当地說过——这一个試驗的証明，其价值等于証明叔叔組織上的改变，不能影响姪子的組織，而姪子的組織依然不变，但是这些魏斯曼試驗却被宣称为“經典性的”試驗。孟青引証魏斯曼的試驗为 Experimentum crucis, (定局的試驗——譯者注)为“遺傳物質”和有机体軀体不相干的決定性的証明，他宣称这些試驗的結果是消極的。他求教于新世紀的資產階級生物学的福音——孟德尔主义，宣称道：“孟德尔研究的主要結果正好是証明了永恒遺傳傾向的存在，这是遺傳傾向不变地一代一代遺傳下來，孟德尔所作的純粹理論上的研究也解釋了关于組合的重要原理，遺傳傾向是永恒不变的，但是它們可以重新編組，由于这样的重新編組（重新組合）就產生遺傳类型巨大的多样性。遺傳性狀重新編組的原理解釋了在所有异体受精的有机体方面——不論植物、动物或者人——遇到巨大数目的各种不同遺傳类型的原因。”

在新時代的資產階級的生物學中，類型不變的原則以遺傳因素不變的形式被確定了。以後這基本類型不變的原

則加上了某些修正，使这个原則变得更有科学的外貌。1927年在柏林遺傳学会議上，海爾曼·И. 謬勒宣布了他的“發現”：經過几万几十万年不变的繁殖以后，遺傳因素在X光作用下可以改变。以后在X光以外又补充上了鐳射綫，一些化学毒藥和温度作用，这些也都被宣布为“突变”的作用者。但是在所有的情形下，都宣布突变在質上与有机体以前的突变及作用于它們的外界条件不相干，更不消說，突变被認為是与有机体的質及其生活机能不相干的了。突变是不符合于生活机能的，类型是不符合于机能的，在本質上各突变彼此間，就好像与有机体的生活条件間一样，都沒有內在的歷史联系——这就是資產階級遺傳学“最新”發現的主旨，而这种遺傳学的使命是給形而上学在理論上“建立根据”，以对抗对自然的歷史观。既然每一个突变是：（1）*sui generis*（自成一类——譯者注），不决定于前一个突变，而且自己也不决定下一个突变；（2）不决定于有机体特征和生活机能；（3）不决定于有机体生活条件，具有絕對的質上的独立，那么还怎么能談得上歷史呢？这种不为必要的联系所联系的独立的事件的研究，不可能有歷史的内容，不能够为定向的、累積变异的自然选择或人工选择的活動供給材料。由这样的、永远不同方面分散的、独立突变的材料中，选择是沒有力量創造任何东西的，沒有力量創造合理的生物类型——但是这也正是資產階級的思想家所需要的，他們在对生物学的歪曲中，为合理生物的形成的非物質起源寻找敞开的大門，而且在这里，他們以往和現在都遵守一定的分工：有一些人伪造事实，“証明”选择沒有力量形成有机体的合理类型，另一些人就發明各种非物質的“組織的”、“創造的”、“有机体的”和其他类似的創造生命类型的“原理”。

資產階級的思想家，就是这样地企圖把唯物主义的歷

史从生物界里驅逐出去，并且在“最新科学發明”的伪装之下，把崇神主义注入到人們的头脑里边。

遺傳学及其精神上的母親——优生学——成为生物学各种不同部門反动企圖的中心；遺傳学变成了那种籠罩着資產階級生物科学的衰敗思想的中心。就是这个本質被歪曲了的遺傳学被反动的思想家赋以“推翻”选择的創造作用的使命，并从而在生物学所有其他部門中确立研究上的崇神主义的观点，因为其他生物学部門也总是和生物界中合理性的問題多少相关的。遺傳学“摧殘了”达尔文主义原理的基礎以后，在西欧和美國各种不同的生物学部門中就开始蓬勃兴起形形色色的、形而上学的“主义”。

最优秀的、最進步的生物学家坚决反抗在資產階級生物学中廣泛流行的反动的和思想腐敗的浪潮。在这些先進的生物学家中，俄罗斯和苏維埃学者K.A.季米里亞捷夫有权利占居首位。在反动思想最初开始的时候，早在本世紀初，季米里亞捷夫就已經了解到：“怀念旧时代的形而上学和倒退的資產階級都願意彼此伸出援助之手。”所有那些引証“最新的科学事实”的人都仇恨地宣称“达尔文主义失败了”；并且——正如季米里亞捷夫所說的——“沉醉于一种愚昧的神秘的狂欢中，拍着自己的胸脯，高兴的嘮叨着：不懂！不懂！永远不能懂！”季米里亞捷夫把这一切科学上的頑固派——首先是伪遺傳学家——称为“与科学背道而馳者”，对于所有这一些人，这位偉大的学者作了应得的、毀滅性的譴責。而且这个对生机論者的譴責，对反达尔文主义者的譴責等等，听來很是季米里亞捷夫式的，就是說分析得深刻，同时也極其清楚而生动，把思想斗争擺在廣大的社会人士面前加以裁判。

偉大的俄國生物学家B.O.科瓦列夫斯基也是和季米里

亞捷夫并肩前進的。科瓦列夫斯基在他短促的、但是富于非常顯赫創造力的一生中，始終忠于达尔文主义的唯物主义原理的旗帜，在他的古生物学的工作中，他就發展了这种达尔文主义的唯物主义基礎。对于科瓦列夫斯基著作的仔細而深刻的研究指明：他的研究工作中成为主題的学說是：类型的改变永远符合于机能的改变，但是这种符合并不一定是適應的。科瓦列夫斯基关于四肢骨骼適應的和不適應的学說在本質上包括三个互相联系的原則，这些原則我們在理論上可以作如下的說明：（1）类型的改变是与生活机能的改变相关的而且是符合的；（2）这些在个体生活活动过程中發生的类型的改变能够遺傳；（3）改变类型所遺傳的符合的机能可能是適應的，但是也可能是不適應的。

科瓦列夫斯基發現并証明了：第三紀的有蹄动物因为奔跑的速度是它們安全的保證，便在机能上从用掌心行走轉变到用趾行走。这就引起了类型的改变，引起了趾的退化过程。这样的退化就一代一代地在遺傳上累積下來了，但是趾的退化也可能通过兩種方法來实现：在第一种情形下，退化的趾僅僅在縮短，而它們下面的部分則繼續在腕骨或者跗骨中占有其面積。在第二种情形下，退化進行的途徑是經過趾的變細，于是就騰空了腕骨和跗骨的面積，這面積被在机能上起代替作用的几个趾（或一个趾）所占領，这些趾担負了起作用的器官的机能，因而就担負起动物整个的体重。無論在第一种和第二种情形下，类型的改变都符合于机能的改变。但是在第一种情形下，这一种符合是不適應的，因为腕骨和跗骨繼續服务于不起作用的、退化了的趾，Xiphodon 和 Anoplotherium 曾經發生过这种情形，Entelodon 也在較小的程度上發生过这种情形等等。但在第二种情形下，符合于机能的类型改变是適應的，因为用腕骨

和跗骨不用的末端部分担负着未退化的、而且适当变粗的、起作用的趾。科瓦列夫斯基把第一种情形称为“不适应的”退化，把第二种情形称为“适应的”退化。

科瓦列夫斯基的工作确定了退化的适应性和不适应性，因而把达尔文的适应性问题研究提高到新的高度上。

科瓦列夫斯基对于Э. 休斯关于种的突然“重造”的类似进化的概念，给予强烈的反驳，按照这个观念，经常不变的种，有时突然得到“重造”。科瓦列夫斯基证明了这一个概念的不科学性。如果焦阿尔与他类似的人们以及摩尔根派所有现代的主张突变论的遗传学家们重视生物科学的具体成就，他们就不会复活科瓦列夫斯基所推翻的休斯的观点，更不会用比原来的概念更为低劣的重版了；他们就不会开始主张：种改变的时期仅仅是种不变时期的破坏。

科瓦列夫斯基创造了达尔文主义的古生物学。这种古生物学的基本的命题是：类型与机能改变具有相符合的关联，有机体的改变与在改变了的条件下改变了的生活方式一致。现代的苏维埃达尔文主义、米丘林学说都是与这个基本命题一脉相承的。

在俄罗斯和苏维埃生物科学的各个不同的领域中，表现了并且进一步发展了达尔文主义的观点，研究工作上的历史生物学观点。在这里只要指出世界上最伟大的苏联生理学家И.П.巴甫洛夫就够了，他用反射作用的生物学意义的观点，把它看作过去历史和现代历史相统一的产物，研究了先天的无条件反射与获得的条件反射。

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生物学领域——进化的形态学领域——中，另一位俄罗斯和苏维埃的生物学家А.Н.谢维尔契夫也曾经走了相同的达尔文主义的道路，他确定了进化的途径和规律，因而多方面地充实了达尔文主义的内容。就

是他——謝維爾契夫——証明了有机体的可塑性具有适应的、生物学的意义，生存性的意义。因此他研究了器官的多机能性的問題，他証明了因为器官能够执行不只一項而是若干項机能，所以有机体在迅速和剧烈改变的情况下便能够迅速地改变其生活方式。謝維爾契夫大大地推动了达尔文主义的研究，确定了形态生理上的進化和退化是有机体在生物学上向前進化的形式，他在达尔文主义中作出了重大的貢獻。非常值得注意的是：謝維爾契夫关于达尔文主义一般問題的、最廣泛的理論总结是在革命以后作出來的。早在1918年，他發表了多次公开的演講，在这些演講里确立了用來研究形态生理的進化和退化的、生物学的、达尔文主义的观点，他用同样的观点闡明了可塑性的問題，也就是动物的結構与行为的变异性的問題¹⁾。在他的卓越的著作：“進化过程的主要方向(進化、退化和适应)”一書里，謝維爾契夫更廣泛地研究了这些極其重要的問題。这种研究工作的达尔文主义观点具有特別的重要性，在当时听來特別有力，因为当时大多数國外的研究者正企圖使动物形态生理学的問題离开达尔文主义，仿佛这些問題与進化及其規律是“不相干的”。

非生物学主义 (Абиологизм)——拒絕考慮形态生理过程的适应意义——是西欧和美國生物学家机械派的观点上的特点；这种观点給新生机論者、神秘進化論者以及其他伪科学的僧侶主义信徒們在解釋適應性問題上留下了活动的余地。我們再重复地說，这就是“最新的”外國生物学中的“分工”，这种生物学宣布达尔文主义是“多余的”、“口头上的”和“过时的”。謝維爾契夫对于这种研究上的非生物

1) 这些演講在1922年出版的謝維爾契夫所寫的通俗小冊子“進化和心理”里得到反映。

學主義的觀點給予了強有力的反駁。

*

*

*

但是在達爾文主義廣泛的一般理論文獻上，仍然保留着重要的缺陷，這種缺陷支援着并武裝着反達爾文主義者的主張。有機體借助于還不為人所知道的方法，發生最初的差異，這種差異在選擇的進一步地創造與活動上是原始的材料。早在1915年，俄國的生物學家H.A.霍羅多科夫斯基就曾指出：達爾文主義的根本任務是“設法解釋應當選擇的最初變異如何發生的方法，用以彌補進化學說最主要的缺點。”¹⁾因為達爾文主義沒有完成這一個任務，所以就允許了各種派別的反達爾文主義者提出系統發育變異性和遺傳性的特殊物質，并且根據這一點把下列的宣布為選擇的材料：“自發的突變”或者在性質上不依賴於有機體生活條件與生活方式的突變，或者在雜交下基因重新組合的“沒有進化的進化”，或者以上三者在一起。同時因為無論是自發的突變，無論是在質上不依賴於有機體生活方式和條件的突變，以及雜交下的“基因”重新組合，都不能為朝着一定的方向累積差異，也就是為選擇的創造活動供給應有的材料，于是就足以宣布達爾文的選擇在種的創造上是無力的，大呼達爾文主義行將死亡，宣稱達爾文主義粉碎在現代試驗遺傳學的鐵壁上了。如果作出這一個結論的是許多的——但不是全體的——突變論者和基因重新組合論者，那麼這個結論由他們對研究的結果所加的解釋上提出來是有邏輯上的必要的。遺傳學的這個新學派的創始人強調地指出：

“選擇不能創造任何新東西”。（約翰遜）

種的形成“不需要任何選擇”。（狄·佛利斯）

1) 霍羅多科夫斯基：“拉馬克主義和雷飛主義”，載“自然”雜誌，1915年。

“自然选择在进化中并不起创造性的作用”。(摩尔根)

新遺傳學派的主要創始人，特殊“遺傳物質”學說的倡議者魏斯曼，企圖用胚芽世界里的競爭來代替適應差異的真正的選擇，但是因為這樣的胚芽競爭不能導致有機體在其類型形成所有各階段中所特有的、對於其生存的特殊條件的合理適應性，所以合理性的問題仍然是唯心主義者們活動的自由天地。一般認為魏斯曼擴大了選擇的活動範圍。這是不正確的，因為他用胚芽競爭代替了選擇。在本世紀的開始出版的“德國人民的金書”里面無怪乎魏斯曼寫過如下的話：

“雖然選擇的原則似乎最簡單地解答了一切現有生物合理性之謎，但是，在進一步研究這個問題時，下列一點便更清楚了：僅僅一個選擇——至少在其最初的範圍上——是不夠的。”

反達爾文主義的反動派慶祝了勝利。看來他們好像是在“遺傳物質”的內部找到了新科學的啓示似的。唯心主義者佛蘭謝高興地指出：“選擇現在有如堆滿積沙的、遺留下來的河床，而知識的河流却替自己开辟了新的河床。原來建築在選擇河岸上的唯物主義的磨房，於是也就閉塞了動力的來源。”¹⁾

佛蘭謝指出圍繞着下列主題：“選擇是無力的原則，這一個原則任何東西都不能創造，充其量不過僅僅毀滅一些東西而已”——團結了“許多最新的學者，其中有T.艾模爾、K.戈白里、B.蓋阿克、B.卡瑟維奇、A.巴烏里、Γ.狄·佛利斯、A.魏斯曼、Γ.沃爾夫。”所有這些生物學家代表着不同的“學派”，他們彼此爭論着，但是他們在反達爾文主義的共同基

1) 佛蘭謝教授：“自然科學的哲學”，載“達爾文主義的現狀”，聖彼得堡，1908年。

礎上，却都是一致的。

狄·佛利斯，契爾馬克和柯倫斯使 1900 年成為具有重要性的一年：因為他們重新發現了孟德爾的工作，這工作同狄·佛利斯的突變論以及魏斯曼的“遺傳物質”學說一同從那時候起就成為反達爾文主義的新福音，形成了孟德爾、摩爾根主義的新達爾文主義學派。分崩離析的資產階級生物學思想的高興的奴僕們狂歡地，像 M.B. 包格斯拉夫斯基之類的人，舉行着達爾文主義的送葬儀式，並宣傳說：“卑鄙的屠殺理論”（包格斯拉夫斯基如此稱呼達爾文的偉大創作——著者）已被埋葬在花壇之下，在這花壇上，盛开着巨大的月見草，並且在一個唯一的坟墓里永遠地埋葬了那種關於適者生存的有害的全部胡說。”¹⁾ 自稱為“現實的、哲學的、神學的科学”的代表者，米丘庫里在他自己的一篇名為“達爾文主義的完全毀滅，以數學公式來表現的、聖經上六日創造世界和世界的瞬間創造”的論文里，很滿意地指出：“達爾文主義體系的全部原理都被新達爾文主義者的全部的、最新的研究所消滅，而這些研究是和我這篇論文的論據一致的。”²⁾

*

*

*

當以孟德爾、摩爾根學派為代表的、所謂“新達爾文主義”極為盛行，越來越遠地離開歷史的和唯物主義觀點的時候，形而上學的混濁浪潮所襲擊着的達爾文主義卻在一個不著名的俄國小城市科茲洛夫（即現在的米丘林斯克——譯者）的安靜的果園里找到了極堅固的基地和創造性的發

1) 包格斯拉夫斯基：“生命的發展”，聖彼得堡，1908 年。

2) 米丘庫里：“達爾文主義的完全毀滅。以數學公式來表現的、聖經上六日創造世界和世界的瞬間創造”，莫斯科宗教事務院出版社，1907 年。

展。

1900年的确是具有重要性的一年。在这一年米丘林开始实现了新的理想，他给自己提出一个大胆的任务：发现有计划培育品种的方法。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需要解决一个达尔文主义还未解决的、最困难的问题。应该发现创造有机体一定的、最初的变异的方法，以便把它们有系统、有计划地加强、累积并形成新的、稳定的特性。

经典的达尔文主义，停止在这一个任务面前，而未能解决它。因为受着当代实践和理论的限制，达尔文把一定的变异性和选择的活动对立起来，达尔文把一定的变异性从选择规律的作用范围中排除了。但是这是错误的，因为选择作用的实质，就在于累积和加强有益的变异。选择是累积的过程，它是创造性的、历史上建造的基础。因此，如果一群个体在一定条件下，根据它们的同型性也发生同一类型的改变，那么，这些变异在有益的情况下，一定是包括在选择作用的范围以内，就是说，当重复这些条件时，它们将要重复地累积和加强。所选择的永远是某一个有益的变异。不论它是个体的变异还是群体的变异。

以后达尔文确定了三种选择的形式：自然的、无意识的和有计划的，达尔文所描写的所有这些选择形式都根据变异性现有的、已经具备的原始材料。在达尔文所考虑的所有这些选择形式之下，选择的创造性活动并不引伸到原始材料本身的创造。较达尔文所提出的和研究的更为高级的选择形式也包括着创造必需的原始材料的一定作用——也就是创造“一定变异性”的活动——和创造品种过程中一定的、有计划的培育活动。

把自然条件的培育作用（自然的“一定变异性”）和自然的选种过程（自然选择）对立起来，是不正确的，而且是没有